

艺术史

江南画史上的几个清代片段

韩进

清代画史一半在皇室笼罩之下。闲逸如江南一片米家山，亦需负载霖雨济世的厚望。张庚、金农、姚燮，云未成雨。戴熙、翁同龢、李慈铭，亦各有痛史。“霜皮雪干支颖壤”的壮志也好，“缓歌慢舞连朝昏”的情致也罢，一部江南画史，亦可谓国士们出云入云的心迹写照。

康熙御用班底的一次商业演出

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回銮后，绘制《南巡图》的任务落到苏州人宋骏业头上。宋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时任御书处办事、刑部员外郎。他的父亲是文华殿大学士宋德宜。

宋骏业向民间广发英雄帖，请到王翬来做总教头。其余杨晋、虞沅、顾昉、王云等人，或能人物，或工界画，各自归位。

画六年，这些地方名手聚集都下，于庸庸风雅的大人们而言，也是难得的便利。个体献艺之外，画家们的组合出演更是别具明星光环。这个团队的具体人数目前还不清楚。主业《南巡图》之外，每次受邀参加团体“商业演出”的人员并不固定。种种皆与现在的文艺组合有相通的地方。高士奇请了五位，陈元龙请了六位。《桃李禽鱼图》，一下子邀请了七位。

一幅《九秋图》（故宫博物院藏）足足请到了八个人：宋骏业画芙蓉花，王翬画丹桂、翠薇，王云画雁来红，徐璋绘月季，杨晋画菊花，吴正又以蓝笔补了一株菊花，顾昉补秋罗花，虞沅画乌柏。这与袁崇正先生所揭示的《南巡图》绘制团队名单仅差一枚一人，可作为相关研究的实物佐证。

八个人共九种折枝花卉，九秋同庆，寓意吉祥。宋骏业的题款高居右上方，表现了他作为官方主持人的中心地位。王翬一人画了两种花卉，也与众不同。画面穿插有致，俯仰生姿，显示了《南巡图》团队调度得当，配合默契。

跟着浦山先生学看画

瓜田逸史张庚（浦山）先生被推荐去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已值乾隆年间，朝廷和文士在角力场上的关系不一样了。浦山先生没有取中，此外可能还有点小小的不愉快。英雄气短，不提也罢。浦山先生也就继续做幕僚，卖点文字，也卖画。当时销路最好的还是仿古画。跟文学的情形类似，仿古的底子，大佬们往往揣着托古改制的雄心。作为中小名头画家的浦山先生却格外认真。

浦山先生有资源，能看到古代大师们的名作，《富春大岭图》《采薇图》。临摹之前，他先仔细观察它们。有的从下往上看，也有从上往下



宋骏业等《九秋图》，故宫博物院藏，自《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金农册页之一，浙江省博物馆藏



看的，并无定式。或者分成若干层，或者揪出几个关键点，揣摩布局用意，还原技法细节。

宋代画家赵孟頫《秋林叠嶂图》中不同寻常的山石技法吸引了浦山先生的注意。不是先定轮廓，继以皴擦，也不是“从碎处积为大山”（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而是笔蘸淡墨，任意涂抹，依其自然形成的浓淡高下，勾勒山形向背。下面枯林挺立，枝桠瘦劲如铁，墨点的刺杉和尖笔画就的瘦树点缀其间。山麓间溪涧流泻，上架水磨，与山腰古刹相互呼应。磐石上拖着古藤，叶子稀落。

好的鉴赏家未必是一流的画家。浦山先生自己画了一件《秋林叠嶂图》，山石以淡墨打底，树木直上插空，显见是在向赵孟頫致敬。但即使是与弗利尔美术馆那件署于江参名下的仿作相比，浦山先生的用墨也远谈不上轻淡匀洁（黄公望《论画山水》中评江参语）。浦山先生没能把他对古代大师的热情灌注到画面上去，也无法赋予它们浑然流畅的气息。不过，这位冷静而高超的“解剖家”，以一部《图画精义》成功地留下了若干古画的标本。后来的仿古家、鉴赏家每每从此路过，都要向他致敬。

都要向他致敬。

讲得一手好故事的金冬心

汪曾祺先生有一篇讲金农的小说。文中讽刺金农、袁枚自托名士风流，实亦汲汲于世俗利益。虽语含辛辣，但不失蕴藉简约，和金农的诗画倒有几分相似。

金农大张旗鼓地组团卖字卖画，团员们琢砚、抄经、写竹，各擅其技。正统的文化修养，在市场中不断打磨试探，融汇成一种个性化的艺术风格。比之职业画工或民间趣味的粗白，金农多隔了一层，耐人寻味；但又较一般的文人笔墨浅近晓畅，富有趣味性。他的藏与露，恰到好处，是旁人不可企及的地方。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幅册页，从右下的菱角生出虬干数枝，梅花几十朵，清丽有致。画面的布局呈辐射状，中有一长枝横斜，往左上延伸。左下留白，是一篇金农自作的诗文。这浓墨刷出的标志性漆书，素享盛名。

梅花柔美，漆书斩截，相映成趣。

漆书工整，阅读起来毫无障碍：蜀僧书来日之昨，先问梅花后问鹤。野梅瘦鹤各平安，只有老夫病腰脚。腰脚不利堂闭门，闭门便是罗浮村。月夜画梅鹤在侧，鹤舞一回清人魂。画梅乞米寻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长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它的内容更像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峨眉山的和尚托人捎了书信过来，殷勤垂问家中各事。先是山中的野梅，再是我养的一只瘦鹤。梅花和鹤都平安无事，倒是老夫我体力大不如前。那就索性闭门自适吧。闭门隔绝世事，我这里便如同罗浮村一般。有月亮的夜里，暗香浮动，我画梅花，瘦鹤陪伴一旁。当它起舞，我的心灵都得到净化。靠画梅去换取口粮是常有的事，但送米来的贵人很少。我和这只鹤便只能忍饥挨饿，疗饥的只有我一个——且携鹤抱梅睡去罢了。

这枝梅花画好，就又有送米来了。金农后来就补了四句：“冒寒画得一枝梅，却好邻僧送米来。寄与中山应笑我，我如饥鹤立苍苔。”（《冬心题画记》）

和尚是四川精能院漏尊者，带信来的是金石家丁敬。金农年届七十，讲穷约，讲趣味，讲情怀，都游刃有余。

绮亦不必纤

词人姚燮邀请最负时名的仕女画家费丹旭郑重地摹绘十二位婀娜金钗。一片溶溶月色之下，她们或案头侍书，或倚树玉立，或捧剑而来，或抱琴款步，或啁啾私语。画面中心位置是姚燮，跌坐蒲团之上。文士、美人各适其适，静谧恬淡。画题却不是红楼金钗，也不是文士行乐，而是《纤绮图》（故宫博物院藏）。

怜悔的是过往放诞的生活，是流连脂粉的不经，还是词风艳宗所犯的绮语戒？“绮”具体化为美人，若真心“纤绮”，便不必把这十二金钗钩写得个个情态缱绻。一看之下，反倒横生障碍。姚燮的朋友王复与我们看法一致，他质疑道：

妾媚千万，风情万千，绮障方深，云何得纤？

其余张凯、戈载、黄鞠、盛树基、黄金台、潘萃、郭传璞等人配合姚燮出演这出清戏代码，称赞他焚弃绮语，稳渡迷津，悟彻三生。

歌直的朋友也不少，张鸿卓担心姚燮定力不足，“只休教、似草情根，傍花生又遍”。陈羲也有同样的忧虑：“只恐摩登花未散，风飘吹动定中人。”

更多的朋友一半谐谑，一半认真地劝姚燮没有纤绮的必要。王寿庭拿历史故事做比“设绛帷，马氏传经；挟红粉，谢公开宴”。齐学裘说：“争妍竞媚左右陈，缓歌慢舞连朝昏。同登极乐之世界，一齐收入解脱门。”“绮”亦不必“纤”，图亦不必存。

雷葆廉填《绮罗香》云：“只脚踏，稳坐蒲团，维摩天女合相伴。”把十二仕女解作天女，自然也无绮可纤。胡远的“尽教红粉归香国，大向花从转法轮”，用意相似。据说胡远这首诗是请许善兰代写的。许善兰还趁机要求青楼三妹之一的蔡韵卿作陪来催动诗思。这种情境之下，也难怪诗中有“纤绮何如不纤便，绮情深处即真禅”的句子了。

署名戴熙的一幅高大松树

署名戴熙的《古大夫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一棵高大松树，虬曲盘绕的枝干，浓密飞动的叶子，构成一种视觉上缠缠向上的动势。戴熙从古代大师的画树中领略笔墨的奥秘，也曾借用山水画的技法来摹绘林木。这些古树和他精神相通。治时或自谦蜗曲无用，乱时却偏要“以霜皮雪干支颖壤”（《习苦斋画絮》）。

树的姿态灵动，似可一洗关于戴熙画境板硬的恶评。这一棵名为“古大夫”的松树，与戴熙自沉时的决绝又是多么地匹配。殉城为戴熙赢得莫大的身后名，直到有清一代的绘画偶像“四王”成为要打倒的封建势力，直到攻城的一方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生得好、爱说好、很自律的戴熙，一生也没能脱开朝廷的羁绊。跌入白云乡，仍未得解脱，一次次被后来人打粉。“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那种打扮。

我选择性地漠视了画面右上方署款题字的不自然——图名四字写得垮掉了。署款时间“道光丙午秋杪”，值道

光二十六年（1846）戴熙结束广东学政任期回京复命途中。核戴熙自录《画絮》，未见此画。傅熹年在八十年代的鉴画过程中，亦定其是仿作。两相结合，基本可以知道这棵松是有问题的。

我急切地想要把这一棵神采飞动的巨大松树归于戴熙，是对于传统士大夫笔墨的克制程度认识不足，也有对于戴熙自我表现性画笔不足的遗憾，也是期望他对于自己的殉城曾有过更多发声。

翁师傅的劝诫

翁同龢画了一幅《风鸾图》（萧山博物馆藏），在空白处题写劝诫诗一首，语重心长地告诫，娃娃们不知厉害啊，仔细这料峭的春风吹破了你们鲜艳的红衣，怎么净顾着跑出来放风筝玩了，在家乖乖读书好不好？风筝线断了还能再接起来，书读不好就没法补救啦。——噢，放风筝最怕的不就是断线吗？不光画人画物，翁师傅画幅山水也能和家国情怀联系起来。但偏画这样活泼泼的《风鸾图》，可见翁师傅其实也是爱玩的吧。

翁师傅公事余暇，爱好收藏书画，兴之所至，提笔摹写。仿过唐寅的《风木图》、钱杜的册页。《风鸾图》（《翁松禅遗画》亦影印一幅，与萧山博物馆所藏为不同的两幅）说是仿徐渭，衣纹爽利，情态逼真。大概是画好自付活泼太过，遂添上这首在今天看来颇杀风景的劝诫诗。他当时正为广东监生录科一事多方奔走，本身又管理成均，负师儒之责。

画过这天，大风积雪，翁师傅从成均值日出来，跌了一跤，幸无大碍。这是他的皇朝学生光绪亲政的第二年，站上维新图存的关口。西风厉害，真的吹破了红衣裳。

爱花也爱画的越缦老人

李慈铭（越缦老人）在紫藤花下读书，直到夕阳西下。院子是租的，花却是自己亲手种下。朋友们叫他一起去考差，考御史，总归是失望的时候多，他也总要发几句牢骚。今天，能同时读翁家侄子的日记，世家伙伴们多数快活，考一次总也能中几个。悲哀其实刻入李慈铭的生命之线。我们在后面遥遥眺望，只觉花下的他让人怀念。

李慈铭作画。以前看朋友周星誉和胡寿鼎作画，大概偷到了一点师。再加上《芥子园画传》这样的图谱，到了后期，他已经能够画画送人了。画得好不好且不说，谁会拿这个来要求他呢？李慈铭把文学上的自信运用到绘画中来，画得很高兴。画幅高松飞瀑挂汪鸣鸾，自我感觉这画境简直超越时下一众庸手。赵之谦给人画《秋灯课诗图》，风格荒寒。因为他是用来纪念自己母亲的，便觉得不大合适，又找李慈铭重画一幅。在李、赵二人多年宿敌，李慈铭没想到在对方最擅长的领域里侥幸小胜一局，很是自得。

李慈铭眼里没有画史上那么多条条框框，喜欢画小青绿。这幅扇面作于光绪十八年五月，稚拙秀润。画面叫人想起李慈铭从周寿昌那里“强夺”的一幅《春湖采莲图》，说是他家乡绍兴的景致。（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发生于汉十年末至十二年初的陈稀之战，是刘邦剪除异性强藩的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场，并与韩信之反、太上皇崩、族韩信、立代王、族彭越、改立梁王等重大事件相关联，成为梳理诸史关系的一个重要枢纽。然而这场战争开始的时间，亦即陈稀反汉的时间，在史料记载中却异常错乱纷纭。

《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十年“八月，赵相国陈稀反代地”。梁玉绳《潜斋论衡》说：“稀反在十年九月，此与《功臣表》作‘八月’，《酈商传》作‘七月’，《傅宽传》作‘四月’并误。本《传》及《汉书》可证。至《淮阴侯》及《卢绾》以为十一年反，尤误也。稀本《传》又误作七年，惟言反在九月是。”（《史记志疑》，中华书局版，第234页）可见陈稀反汉的月数有四月、七月、八月、九月四说。《汉纪》《资治通鉴》《西汉年表》均从九月说，梁玉绳更断言九月为确，此后如清人夏燮的《校汉书八表》、当代学者王云五的《秦汉史编年》等专著，以及自思思勉以来的大多数秦汉通史，也都采信九月说，但诸家并未提出依据。

若对与之相因果的事件作一分析，《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附陈稀》载：“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稀，稀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可见“太上皇崩”是陈稀之反的直接诱因，该事的日期明载于《汉书·高帝纪》：“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并与《高祖本纪》的“十年七月”、《卢绾传》的“十年秋”相合。案十年七月癸卯为十三日（《张家山汉简《历谱》》，当日立秋（徐锡祺：《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第1290页），记载可信，这是陈稀之反的时间上限。又《史记·

卢绾列传》《彭越列传》均载陈稀反于秋季，而十年的秋季从七月癸卯立秋延续至后九月乙亥立冬。可见陈稀反于七月、八月或九月都是合理的，九月说不可偏执。

1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张家山汉简《奏谏书》是汉初的一种案例集，其中的“狱史闾案”为我们提供了厘清这一问题的重要契机。该案判决记录云：

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大（太）仆不害行廷尉事，谓胡奇夫：谿（谿）狱史闾，谿（谿）闾有罪，廷以闾，闾当黜为城旦，它如律令。《二年律令与奏谏书》，第339页）

彭浩先生指出，这个“十年”据月朔可推知为汉十年，“大仆不害”即《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的“汲绍侯公上不害”（《谈〈奏谏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行廷尉事”是所谓的“行官”，指本官一时不在，而由他官暂时代行该官事务（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西书局版，第382页）。李安敦、叶山指出，“廷以闾”是“廷尉以闾”的简称，指廷尉将案件报告给皇帝，这表明该案的判决是由皇帝直接作出的（Law,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Volume.2,P.1206）。可见汉十年八月四日这天，公上不害以大夫之职代行一时

不在的廷尉的事务，下达了刘邦对“狱史闾案”的判决。

十年八月四日这天的汉朝廷尉是谁，又是因何不在而不能履职呢？根据《汉书·公卿表》的记载，汉五年廷尉为义渠，十年廷尉为宣义，那么公上不害于十年八月行廷尉事，若非在宣义就任前顶替义渠，就应在宣义就任后顶替宣义。而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义于十一年“二月丁亥”封侯，不害则于“二月己巳”封侯，旧本《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则作“三月乙酉”，梁玉绳已辨二者并误（《史记志疑》，第59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作“二月乙酉”，仍不合历朔。今案十一年二月丁亥朔，无乙酉日；且《侯表》的记载以受封时间为次，不害之前的威感侯的受封时间也误为“二月乙酉”，之后的吕臣则受封于“二月辛亥”即二十五日，因此不害的受封日期有可能是“二月己酉”即二十三日，因形近而讹为“己巳”“乙酉”。宣义和不害的“侯功”分别为：

（宣义）高祖六年为中地守，以廷尉击陈稀，侯，千二百户。就国，后为燕相。

（公上不害）高祖六年为太仆。击代稀，有功，侯，千二百户。为赵太傅。

按照《史记》《汉书》诸《表》的文例，“以廷尉击陈稀”“为太仆。击代稀”，说明宣义、不害是在廷尉、太

邹助

仆的任上从军击陈稀的。又据《汉书·高帝纪》，陈稀反于十年九月，那么不害于八月以大夫之职擢行廷尉事，其后宣义就职廷尉，于是二人于九月分别在太仆和廷尉任上从军击陈稀，似乎是最自然的解释，李开元即主此说（《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287页）。但若细绎史料，即可知此说是难以成立的。

据《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等材料，刘邦于十一年春击破陈稀军，又克东垣，于春正月返回洛阳，用夺取的代地和部分赵地封刘恒为代王，取得战争初步胜利。作为标志性事件，克东垣不晚于十一年二月（《韩信列传》《高祖本纪》），立代王则在十一年正月丙子即二十日（《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而从十二月癸巳到三月癸酉的这段时间，包括宣义、不害在内的十六人相继以击陈稀功封侯（《侯表》），这显然是初步取胜之际的集中论功活动。以上三事的时间相吻合，可以推定，平陈稀第一阶段的战事应结束于十一年春正月。而当刘邦击陈稀初步取胜返回洛阳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故梁王彭越“复谋反”一案：

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诛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彭越死后，刘邦于十一年二月丙午即二十日改封刘恢为梁王，故该案的奏请不能晚于刘恢受封日。奏请其事所

谓廷尉“王恬启”，梁玉绳和当代学者唐子恒均指出其误（《“廷尉王恬启”小考》，《文史哲》2000年第3期），但此时宣义已非廷尉是毫无疑问的。从《侯表》来看，他应在十一年二月丁亥受封后不久即“就国”，直到十二年二月封燕王刘建后就任燕相。

若认为宣义任廷尉是在“八月癸亥不害行廷尉事”之后，则其任期处于十年八月到十一年二月之间，几乎完全处在击陈稀第一阶段的战事中。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廷尉肩负着“决疑当谿，平天下狱”的重任，仅《奏谏书》中就保存有八件高祖时期地方奏、谿至中央的案例，足见当时廷尉的日常事务并不轻松，宣义要在戎马倥偬中兼顾本职，几乎无法合于事理。

相比之下，公上不害所担任的大仆一职则不受从军的影响，因为“仆”类职务本为侍从性质，《周礼·大仆》郑玄注：“仆，侍御于尊者之名。”又承担为主人取车的任务，《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仆，御也。”大仆作为君主的侍从近臣和取车，能时刻伴随君主左右，在行军途中也是如此。大仆在行军途中代替廷尉为皇帝上传下达奏谏案件，其情形与松栢汉简“令丙第九”规定的向皇帝献批批要送至“行在所司马门”是类似的，大仆和司马门都有车政、马政的职掌，不但便于执行传达工作，也是距离“行在所”最近的外朝职官。（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所论，“十年八月癸亥大仆不害行廷尉事”更应发生在宣义就任廷尉之后，而他们以廷尉、大仆之职从军击陈稀则是八月癸亥之前的事。整个来龙去脉可厘清如下：十年八月癸亥即四日之前，刘邦已从关中出兵击陈稀，廷尉宣义和大仆公上不害等人从军，行军途中，“狱史闾案”由胡县上谿至“行在所”，因宣义无法视事，便由公上不害代行廷尉事务，向刘邦上奏该案，并于癸亥日下达了刘邦对该案的判决。

林剑鸣先生叙述陈稀事时说：“九月，稀公开宣布反汉”（《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7页），将陈稀九月反理解为“公开宣布反汉”，是一种很好的启发。照此思路，则所谓陈稀七月反或指七月召稀不来，八月反则指刘邦于八月出兵征讨，九月反则指陈稀于九月“自立为王”，公开反汉，各种歧说的实质不过是嗜人书法的不同而已。

以上所论还可与如下事实相契合。《史记·高祖本纪》载十年“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可知九月时刘邦的军队已经抵达邯郸，陈稀于该月公开反汉，大约与此无干系。案《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一月癸巳从宗周出发，戊午渡孟津，《律历志》作者计其行程为：“孟津去西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这可视为西汉末期人对行军速度的认识。如上说，刘邦的军队八月从关东出发，九月抵达邯郸，这是非常合乎当时的行军里程的；反之，若认为九月才发兵，当月即抵达邯郸，则无疑于自虐了。（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